

收稿日期:2024-05-26

《海国四说》借词研究

王祖霞¹, 孙欣然²

(1.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2. 德国班贝格大学 人文学院, 巴伐利亚州 班贝格 96047)

摘要:史料笔记《海国四说》是清人梁廷枏阐述“筹海防夷”思想的代表作,书中不乏记录异域概念的汉语借词。与源词对比,这些汉语借词的语音出现了一些规律性变化。就词形来看,增加长度、增“口”为饰使得部分借词形式具有明显的异质色彩;择取用字、增加语素又使得部分借词的本土色彩渐浓,其中,择取用字是利用可视化特点去构建词形与词义的关系,增加语素则旨在强调语义、凸显类别。异域概念一义多形现象较为普遍,这与书写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书写者的用字习惯、语音感知等有关。这些或为清代笔记词汇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海国四说》;借词;异质;一义多形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1-0088-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明清笔记借词研究”(19YJA740059)。

作者简介:王祖霞(1976—),女,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孙欣然(1999—),女,江苏盐城人,德国班贝格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1.009

作为较早倡导“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清代广东人梁廷枏长期生活于粤,曾入职广东海防书局,对海防、外交问题极为关注。在广泛搜集对外资料、“闻夷事”之中,他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将其形诸笔端。1846年,为了“筹海防夷”,他把此前所著《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合编成《海国四说》。这部史料性笔记详备地记载了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历史等,人们可以由此明其“土俗攸殊”“源流颠末”,因此该书足资稽索。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其中词语的借用是常见现象^[1]。词语的借用,实质上就是用目标语记录源词的概念。就汉语借词而言,异域概念是其内容。《海国四说》中借词数量大,形式丰富,特点鲜明,值得研究。以书中借词为观察对象加以分析,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可为清代笔记词汇研究提供参考。

一、借词的产生途径

伴随着朝贡、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接触,一些异域概念进入中国,为了表达这些异域概

念,汉语中出现了不少借词。

(一)朝贡中的直接接触

为了尽显“绥怀藩服之至意”,清朝沿袭明代朝贡制度,对来华朝贡国“燕劳有典,伴送有官,厚往薄来,恩施优渥”^{[2]164}。以暹罗为例,该国以朝贡(含接贡、探贡、补贡)之名来华活动频繁,抵华人员数量可观。“贡使入京伴送官,文职应委道、府大员,武职应委参、副大员,并委丞倅一员随往,长途护送进京外。”^{[2]200}在贡使入关、入京、离京、出境过程中,与其接触的有礼部司官、笔帖式、士兵、通事、商人等,接触者甚多、接触频繁。其中伴送人员,在贡使入京、离京途中,“与贡使伴行日久,一切与之相习”^{[2]166},这种“相习”“伴行”使彼此语言接触频繁且深入。来华贡使在华期间与清朝官员、百姓的接触是多层面、多元化的,涵盖了不同层级的官员和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接触不仅涉及官方的外交事务,还包括了民间的商业交易和个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和频繁的语言接触,贡使与清朝人员之间很可能会产生词语借用现象。

(二)贸易中的直接接触

粤、浙、闽等沿海地区是外贸的主要区域。无论是外商入华经营,还是华人出海贸易,都为语言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清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的规定包括“外洋诸国夷人,自置货船来广贸易,自应专差夷目亲身管驾,不得令内地商人代为贩运”^{[2]194},但实际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州、潮州等地,船户替外商驾驶船只、代为贸易的情况较为常见。这些沿海国人因语言、人情、礼仪等方面的优势而与外商有着较密切的接触和交流。

另一方面,清代海禁之前,沿海百姓“得以五百石以下船出洋贸易”^{[2]220}。华人走出国门,成为从事海外贸易的“游商”。有的“游商”则长期在海外经营,甚至寓居海外,在异域成婚生子,绵延后代。《海国四说》记载:徐宽等九十六人曾于乾隆七年充当暹罗来华朝贡的随从,他们的祖籍在粤、闽、赣等地,后来移居暹罗,“历经数代”,成为暹罗土著^{[2]181};建汀州的客家商人谢文彬贩盐出海,寓居暹罗,官至“坤岳”^{[2]171}。这些走出国门的华商,大多是双语者,他们在输出物品的同时,把中华传统文化、汉语、汉字传播至所到之处,也对所到之处的语言有所了解,有的甚至会讲当地的语言。据《海国四说》记载,清代旅行家谢清高“为贾于海十四年,所至习其言语,记其岛屿、风俗”^{[2]102},他精通外语,能“悉操西洋音”向老乡杨炳南口述海外经历^{[2]102}。

(三)纸质媒介中的间接接触

书籍、报纸是传播异域文化的重要媒介。清代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或用汉语著述,或把异域之书译成中文。据《海国四说》,“最重而通行”的新闻书(magazine)随着“市舶”传播到各国,使得“一事作而远近周知”^{[2]89}。当时,一些“粗习中华文字”的外国人“译梓成帙”,所编新闻书流入沿海地区的“市廛”,其内容或介绍天文,或记述风土,给国人提供了了解异域文化的途径。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就曾参考过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书籍和报刊等纸质媒介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也是不同文化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文书也是异域文化传播的媒介。朝贡之国在来华时要提供“表文”作为凭证,这些凭证经过广东等省地方官员核实后上报朝廷。乾隆六十年,博尔都噶尔国(葡萄牙)以“夷字正、副表”及译文进献,总督朱珪发现译文“虽系中华字书,而文理舛错,难以句读”^{[2]245},令人核对,备译文;嘉庆九年,英吉利商人转呈“夷字正、副表”,总督倭什布“随令将夷字副表译出”^{[2]248}。翻译外交文书,

一般由精通外国语言的译字官、通事完成。他们在对外口语、书面语交际中起到协助沟通作用。英吉利贡船自津入境,闽浙总督董教增选“谙晓夷语、夷字者二人”分送直隶、浙江衙门备用。清代,广东是外国人入华的重要通道,中外往来频繁,除了译字官、通事等双语人才外,其他相关人员对一些异域概念也应有所熟悉。

此外,一些来华传教士,不仅“喜购内地书籍”,还要延请中国人教其汉字、汉语。为了传道,他们刻《圣书》,“遣人于粤东会城市集之地,按户遗送”^{[2]7}。因对“中土文义”的掌握不够深入,翻译时,“词未畅达,又从译转,益易浅俚,仅可会意而得之”^{[2]7}。至于外商,有的“通汉语”“精识汉字”,有的则仅仅“粗知汉语、汉字”。明清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粤地成为贡使、外商、传教士入华的“第一站”。这些外国人接触到的是与官话差异较大的粤方言,该方言的语音与中古汉语接近,词汇和语法则残留着古越语底层^[3],这给他们的学习和交流增加了难度。据《海国四说》记载,在华多年的英国商人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曾在乾隆年间随使入京,他虽谙习礼节,但对汉语、汉字不甚了解。

总体而言,在与来华人员的语言交流之中,一些“此无彼有”的异域概念会被接触者引入汉语。

二、借词的语义内容

借词的语义内容主要指进入目标语(汉语)的异域概念。就《海国四说》而言,一些异域概念伴随着朝贡、贸易、文化交流等传入中国,进入清代文人梁廷枏的视野,出现于他的史料笔记之中。这些借词的语义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宗教、地理、物产等方面,例如:吗嘎尔呢/吗甘呢(Macartney)、吗诺叻萨喇哒惹(Manuel de Saldanha,《大清会典》中为“吗诺叻萨喇哒”)是人名,弗喃西(France)、热尔玛尼亚(Germania)是国名,西尔格社(Selkirkshire)、士郎(Ceylon)、秣达喇沙(Madras)、磨面(Moulmein)、马功格(Malacca)、的赙士(Texas)、槟榔屿(Penang)、士葛达喇(Socotra)是地名,葛尼(god)、巴底利(buddhahood)是宗教术语,撒久(circuit)、质治(judge, justice)、利委奴(revenue)、马落(manor)、巴里满(parliament)与政治制度等有关,架非(coffee)、厄马(emu,一种因鸣声得名、形似鸵鸟而较小的鸟,产于澳大利亚)、鲁碑(rupee)、棒(pound)、磅(pang)与经济、动植物等有关。

为了“广异闻而备外纪”^{[2]52},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实录了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朝贡贸易、与欧美外交贸易的情况,其中涉及诸多异域概念,因此书中借词最是丰富。梁廷枏主要采用音译的方法处理异域概念,尤其是一些国名、地名、部落名、河流名、人名等,音译现象较为普遍,这与该书的著述目的有关,也与梁廷枏对某些异域概念的粗略认知有关。梁廷枏在序言中言及异域“土俗攸殊”,中国人“偶有纪述所见闻,亦堪荟萃。然大率详今略古,究未得其立国之所由来”^{[2]103},或“前贤实缺纪载,案牘所存,又多系市易禁令,间有得于通事行商所口述者,亦苦纷杂,难为条绪”^{[2]51-52},基于此,他博采众家之长,详核有加,对于那些不熟悉的概念,采用了最直接的音译方式。

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接触中的常见现象。《海国四说》中记录的是当时的汉语,从梁廷枏所记借词的语义内容来看,主要是那些“对方语言中有而自己语言没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名称”^[4],不成系统。

三、借词的引入方式

借词的引入方式主要指异域概念引入汉语的方式。《海国四说》中普遍存在的借词以纯音译为主,半音译半意译等类型的借词数量远不及纯音译借词。

音译是人们引入异域概念时最为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种生成方式体现出语言学中的“省力原则”。《海国四说》中借词以音译方式为主,这些音译借词又以纯音译居多。例如噶叻都(Gottardum)、百尔西亚(Persia)、布路亚(Portugal)、洛尔什(Dorset)、西鲁力斯(Silures)、矮西尼(Iceni)、兰加斯特(Lancaster)、弥撒(missa)、波毕(poppy)、甲必丹(captain)、阉治弥索(archbishop)、不列士顿(president)、冈色尔(council)、色吉力达厘(secretary)、士迭(state)、占麻连(chamberlain)、比马士达(paymaster)等等。其中“甲必丹”,或认为源自荷兰 kapitein,或认为源自马来 kapitan。有学者指出,19世纪,荷兰殖民者在东印度群岛采取华人治华的方式,被授权的华人首领被称为华人甲必丹 kapitan Cina^[5]。上述都是单纯词。

《海国四说》中,非纯音译的借词以“音译+类名”为多。例如经士冕治官(King's bench)、色孙官(sessions)、博尔都噶尔国/波而都瓦尔国(Portugal)等。虽然《海国四说》中还有“半音译半意译”等形式,例如南亚墨利加(South America)、阿麻领社(Aberdeenshire)、曼付社(Banffshire)等,但纯音译借词还是主要的。有学者认为,对于陌生的异域概念,人们之所以选择音译方式,与不解其意有关,也与只需记音、略知其义即可的认知有关^[6]。这一点,《海国四说》可为佐证。此外,《海国四说》中还有纯意译词,如千里镜(telescope)、显微镜(microscope)、公会(parliament)、甜河(River Shannon,即香农河)等。有不少借词形式上带有“洋/西洋”“番”等标记,如番银、西番、白头番(印度)、花肚番(缅甸)、红夷、夷馆、倭缎等。

四、借词的语音变化

异域概念进入汉语后有显性的语音变化,即从源词到汉语借词,语音上发生了显著的规律性的变化。此处仅以英语源词与汉语音译词为例,其变化主要有:

(一)发音部位或方法发生变化

r→l:“Arabas→阿黎米”“revenue→利委奴”“baron→马伦”“secretary→色吉力达厘”“Renfrewshire→凌埠流社”中“r”译成“l(黎、利、伦、厘、凌)”。

d→l/n:“Madagascar→马利加时架/麻利加时架”“Denmark→领墨/璁国”“Dumbartonshire→揽麻顿社”中“d”译成“l(利、领、璁、揽)”,“god→葛尼”中“d”译成“n(尼)”。

d↔t:“Sweden→苏以天”中“d”译为“t(天)”,“Stafford→斯达贺”“state→士迭”“committee→甘弥底”中“t”译为“d(达、迭、底)”。

b→m:“baron→马伦”“Bombay→望迈”“broad→墨”“Arabas→阿黎米”中“b”译成“m(马、迈、墨、米)”。

p→b:“parliament→巴厘满”“Poryugal→布路亚/博尔都噶尔国”中“p”译成“b(巴、布、博)”。

s→sh:“treasury→特利沙利”中“s”译成“sh(沙)”。

ch→zh/sh:“chief→知付”“chancery→占色利”“bench→冕治”中“ch”译为“zh(知、占、治)”,“Seychelles→息赅厘”中“ch”译成“sh(赅)”。

c→s:“chancery→占色利”“chancellor→占色腊”中“c”译成“s(色)”。

s/c→x:“Seychelles→息赅厘”“session→些孙”“nisi→尼西”中“s”译成“x(息、些、西)”,“Bercia→伯尔西亚”中“c”译成“x(西)”。

f→h:“Oxford→恶斯贺”“Stafford→斯达贺”“Norford→洛尔和”“Forfarshire→和化社”中“f”译为“h(贺、和、化)”。

综上,《海国四说》中借词的变读现象可以概括为:“d↔t”,“r→l”“d→l/n”“b→m”“p→b”“s→sh/x”“c→s/x”“ch→zh/sh”“f→h”,等。这一情况与《海国图志》的音译词的特点基本

类似^{[7]1-8}。

(二)连读、省读现象

对于英语源词中因连读而发生变音的现象,《海国四说》中汉语借词记音时会加以体现。例如:“general”的音译词为“依尼拉尔”,“of”的音译词为“阿付”,“general of”则为“依尼罗付”,连读时,前一词中“l”与后面的“o”结合,译为“罗”。又如:梁廷枏将“lord”译为“律”,“lieutenant”译为“流底南”,但在“lord lieutenant”中,则直接译成“律底南”,这是因连读而出现的省读现象。又如“royal dukes→罗压尔录司”。有时,省读现象直接存在,例如:“Gibraltar→急卜碌”“India→烟”“Perthshire→拔社”“Berkshire→脉社”等。有时,则是末尾音省略,例如:“lord→律”“land→兰”等。

五、借词的形式变化

汉语借词的形式上出现异质性与本土化并存的情况。有的异域概念,在进入汉语之时或之后,出现了一义多形现象。

(一)异质色彩显著

异域概念进入汉语词汇后,其形式具有明显的异质色彩。主要表现为词形增长、增饰,这两点在凸显借词的异质性上起到积极意义。

1. 词形增长,以多音节词为主

表达异域概念的音译借词的语音形式大多比较长。《海国四说》的音译借词中有奄/庵(and)、窝(war)、厘(the)等单音节的,戈达(court)、法士(first)、比士(peace)、西尔(seal)、阿付(of)等双音节的,但更多的则是三音节、多音节词,例如流底南(Lieutenant)、阿西士(assize)、利未亚(Libya)、不列士顿(president)、依尼拉尔(general)、甘摩孙拿(commission)、布来阿士(prius)、璞士爹百耶(Australia)、马利加时架/麻利加时架(Madagascar)、墨瓦腊泥加(Magallanica)等。在这些音译词中,汉字失去了自身的理据性,仅仅是记音的符号。也就是说,汉字“见形知义”的特点在音译借词中失效。

要注意的是,一些汉语音译借词会改变源词的音节数量,或者忽略其内在结构。例如“Commander of Forces→甘曼那阿付厘贺些士”。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曾指出“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并分析其原因在于“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8]152}。

2. 词形增饰,用“口”旁凸显记音功能

或使用已有的左边带“口”的汉字,或在汉字左边增加“口”旁,新造汉字,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凸显其所记录的概念的异质色彩。例如:嗑咩喊、哆咻咬、喽嚟哆等人名,弗喃晒、啖咭喇等国名,哪吗、呀兰地密吨(大不列颠)、峨哑等地名,幼喂香、阿噶达、咩叭(法语 beige)、哆啰呢(一种较厚的宽幅毛织呢料)、沙喃匏(波斯语 Sanahbaf)等物产名。《海国四说》中通过“口”旁凸显借词异质性的,主要是人名、国名、地名等概念。

用左边带有“口”旁的汉字拟音,这是汉语中早就存在的、常见的用法,比如常见的拟音词。后来,佛经传入中国时,译经者构造了大量的译音专用字,其中在原字上增加“口”旁是新造佛经译音专用字的常见方式之一^[9]。明清时期,在记录源自西洋的异域概念的语音时,人们自然而然

又再次使用这样的方式,这就使得借词中出现了诸多左边带“口”旁汉字,例如“威咻哗喃至哪嗖”“威咻哗兰至哪嗖”等,有的甚至是在原有汉字的左边增加“口”旁新造而来,例如:啖咭喇。

可以看出,用左边带“口”旁的汉字记录异域概念的语音,旨在凸显该音译词的异域身份。有无“口”旁对借词所表示的异域概念没有影响,从某种意思上来讲,“口”是具有标记作用的“羡余成分”。这一方式,清代其他笔记中也有使用。例如: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外夷月日》中记载“三月曰吗治,四月曰噤悖厘尔,五月曰咩”^[10],其中“吗治”即 March,“噤悖厘尔”即 April,“咩”即 May,“吗”“噤”“咩”仅仅记音。

(二)本土色彩渐浓

对于陌生的、不了解的异域概念,人们往往会采用最直接的方式,即音译。“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11],文字的作用在于记录、体现语言。语言符号有能指、所指之分。就借词而言,语音属于能指。作为书写符号,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其中字形是汉字的“能指”,字音、字义则是“所指”。用于记录异域概念语音的汉字往往出现音、形与义割裂的情况,这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修正。强化能指是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强化能指的方式有:择取与异域概念相关的汉字,以便最大程度达到“见形知义”的目的;增加汉语语素,且该语素与异域概念紧密相关。具体而言:

1. 选择能反映异域概念的汉字

利用汉字“见形知义”的特点,借词的书写者有意择取所指相关、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源词。“社”是《海国四说》中常用的借词记音符号。该书共有“十社”地名四十余处,这些地名主要分布在英伦、斯葛兰两地(见《兰仑偶说》卷二),即育社、支社、稔社、舍社、脉社、拔社、兰加社、畚勒社、拉落社、邑匪社、曼付社、罗斯社、埃野社、那纳社/腊纳社、麻立社、麻壹社、和化社、领戈吾社、稔达温社、哈领顿社、蒙斯麻社、结尼司社、斯达凌社、凌埠流社、揽绯里社、沙特兰社、西尔格社、麻里垣匿社、经加那引社、加尔格墨利社等等。上述词语中,“社”记录的是英语源词中“shire”的语音。据研究,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郡”的名称是“shire”。“shire”源自古英语“scir”,“scir”表示部分(整体的部分)^[12]。汉语中,“社”早就表示集体性组织、团体,晋佚名《莲社高贤传·慧远法师》:“结社念佛,世号十八贤。”明张溥《五人墓碑记》:“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后来,“社”逐渐产生“社区”义。《海国四说》中由“社”构成的一些借词中,“社”是音译兼意译成分^{[7]4}。除上述英伦、斯葛兰两地诸多“十社”地名外,还有巴社(Bercia)、普鲁社(Prussia)等。上述,与“社”相关借词的异质色彩弱化,“社”已经具有类词素的性质。

上述情况表明,实际上是人们借助汉字的可视化特点,最大程度上构建词形与词义的关系。

2. 增加能反映异域概念的语素

有时,直接把与异域概念相关的汉语语素附在音译成分后,充当中心语,构成偏正式借词。显然,这个汉语语素在凸显异域概念的内容、类别上具有积极意义。例如:经士冕治官(King's bench)、甘文布列官(common pleas)、溢士知加官(exchequer)。就功能而言,“官”具有强调语义、凸显类别的作用;就形式而言,改变外在形式、内部结构,同时使得借词的本土色彩更加浓厚。又如璁国(Denmark)、阿噶达片(agate)、克力士顿教(Christian)、厄日多国(Aigyptos)、破路斯国(Prussia)、巴尔萨吗油(balsam),皆是如此。其中“阿噶达”是“agate”的音译,这一类音译词,严格来讲已经不是纯粹的音译词,增加的成分表示词义,整个词属于偏正结构。

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不仅引入了大量的异域概念,还巧妙地通过借词

将这些外来概念融入到汉语体系之中,既保留了异域概念,又使之与汉语文化相融合,从而赋予借词本土化的特征。这种方式既体现了作者对海防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异域文化的认识,也反映了当时汉语词汇创新的特点。

(三)一义多形现象普遍

1. 表现:译字“纷歧”

《海国四说》中一义多形现象比较普遍性,这些形式的出现具有偶发性、临时性的特点。例如:英哇呢斯社/英哇尔社/英哇呢社(Invernessshire),比墨司社/北默司社/北默尔社(Peeblesshire),马哩询/麻里询(Mauritius),爱伦/耳兰地/以耳兰/埃伦(Ireland),等。以上都是地名,徐继畲曾指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8]152}实际上,不仅地名如此,国名、人名、河流名等亦是如此。例如:百尔西亚/白尔善(Persia),新地坡/新嘉坡(Singapore),璁国/领墨/大尼/大泥亚(Denmark),苏以天/瑞典(Sweden),索露/孛露(Peru),日色马尼/略西马尼(Gethsemane),依来西白刺/依里萨陌/依里萨柏/以利撒毕(Elizabeth),等等。

2. 原因:书写者用字习惯、语音感知、主体的多元化等

一义多形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书写者用字习惯是最为主要的。不同书写者记录同一异域概念时,会受到自身书写用字习惯的影响,出现书写“译字纷歧”的情况。梁廷枏在《兰台偶说》卷三中记载了这种情况,即“然《图志》称为那波利稔。而《统纪传》又以为那波里云。两书情事既小异大同,而译音尤为相近,为人同名异无疑”^{[2]148}。其中“那波利稔/那波里云”是Napoleon的音译。《海国四说》中类似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主要与该书的资料来源有关:或是梁廷枏亲身经历的“夷情夷事”,或是他“荟萃诸书所纪述”的。就后者而言,或源自《海国图志》(魏源)、《安吴四种》(包世臣)、《中西纪事》(夏燮)等“时贤著作”,或源自《美利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地球说》(理哲)、《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郭实腊)等“彼所自说”的西方报刊和书籍。

有时,同一书写者记录同一概念时也会采用不同的书写形式。例如“general”的音译借词形式有“依腊尔/依尼腊尔/依尼拉多”,“president”的音译借词有“勃列士顿/布力士顿/不列士顿”,“chancellor”的音译借词为“占色拉/占色腊”,“exchequer”的音译借词为“士支厥/溢士知加”等。那些词根相同的源词也会出现不同的书写形式,例如“treasure→特里舍里”“treasurer→土厘沙腊”“treasury→特利沙利”。

有的则与书写者所熟悉的方言语音有关。“干丝蜡”,早见于明末《东西洋考》(刊于万历四十五年),是Castilla的音译,其他文献中还有“干系腊(蜡)”的写法。张强认为“干系腊/干丝蜡”带有福建方言色彩:闽方言中“丝/系”的发音最接近Castilla中的“sti”,漳州、莆田方言中“干”的发音最接近Castilla中的“ca”^[13]。又如“苏以天/瑞典”,粤方言中“苏”“瑞”的声母、韵腹相同,读音相近,可以用来记录同一语音,造成音译用字不同^[14]。

有的则与借词来自不同语言有关。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发音往往不同,与异域之人接触的国人根据其语音记音就会产生不同的形式。例如:“以西把尼亚/日斯巴尼亚/依西把尼亚国/以西把尼亚国/西班牙/是班牙”中,“以西把尼亚/日斯巴尼亚”是西班牙语Espana的直接音译,“西班牙/是班牙”是英语Spain的音译。

有的则与引入方式有关。例如:上文提到的“依西把尼亚国/以西把尼亚国”属于“音译+类名”式,“国”的加入凸显了概念属性。又如:“索露/孛露/白露国(Peru)”“加士比俺海/里海/死海

(Caspian Sea)”,或音译,或半音译半意译等。

3. 发展:定形与淘汰

在异域概念进入汉语之初,人们对其比较陌生,记录时容易出现“译字纷歧”的现象,这些形式大多具有偶发性、临时性。随着接触的深入,异域概念逐渐扩散,进而被更多的人获悉。由于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语言交际的辅助工具,语言交际的明确性需要,必将促使单个源词的某个或某几个形式逐渐被大家熟知,最后约定俗成,逐渐“定形”,而余下形式终究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如:“波毕/罂粟/鸦片/鸦片烟/烟泥”组,“波毕”指罂粟,是植物名。“取其浆,转为块”,鸦片是罂粟制成品的俗名,“鸦片烟”凸显鸦片的属性。“烟泥”的得名与鸦片的色泽、形状、属性有关。至于源词,“波毕”是英语 poppy 的音译,这是没有争议的,“鸦片”,或是 opium 的音译^[15],或是 apyun 的省译(“鸦片”对应着 ap 的读音)^[16]。其他文献中还有“阿芙蓉”的写法(afyun 的音译)。梁廷枏在《海国四说》指出:“波毕者,即罂粟花中卉本也,俗谓之鸦片,以吸烟于火曰鸦片烟。”^{[2][15]}从叙述中可以看出,此时“鸦片”已经成为“apyun”或“opium”这个异域概念的常用形式,成为通行称呼。该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编写外国通史的先例,也使其对西方国家的介绍得以较同时期其它著作更为详切”^[17]。在这部笔记中,梁廷枏引入诸多异域概念,这些概念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汉语之中,或隐藏于人们熟悉的形式之中。这些概念主要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宗教、地理、物产等方面,从语义内容来看,借词呈现出“不成体系”的特点。

从源词到汉语借词,其语音上出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就借词系统而言,一是借词大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部分音译词通过择用字、增成分等手段去除自身的异质性。书写者在记录异域概念时既要凸显其外来身份,即异质性,又深受汉语的影响,趋向于符合汉语词汇的特点,即去异质性(本土化)。二是一义多形现象比较普遍,其成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发展,有些形式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常用形式。从《海国四说》中可以看出,借词不仅受到源词的影响,还受到书写者的主观认知、著书目的,以及汉语本身特点等多重影响。借词,在记录异域概念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汉语的语言环境。这些为清代笔记借词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杨春宇,郑含英. 语言接触视角下近代东北方言借词词源的构成[J]. 汉字文化,2023(23):10-13.
- [2] 梁廷枏. 海国四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3] 邓小琴. 粤方言书面化及其历史演变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1:7.
- [4] 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07.
- [5] 何美兰,威文恺. 19世纪爪哇的华人甲必丹制度初探[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27-31.
- [6] 段晓彦,俞荣根. “陪审”一词的西来与中译[J]. 法学家,2010(1):40-53.
- [7] 吕俭平. 《海国图志》中外来词的特点[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8.
- [8] 徐继畲. 瀛寰志略[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9] 马乾. 佛经译音字用字研究[J]. 唐山学院学报,2014(2):76-78.
- [10] 梁章钜. 浪迹丛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3.
- [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7-58.
- [12] 孟广林.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9.

- [13] 张强. 明隆庆万历前后福建人在欧洲地理认识上的突破[J]. 东南学术, 2022(3): 219 - 228.
- [14] 李运富, 牛振.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 以《海国图志》为例[J]. 语文研究, 2018(2): 43 - 50.
- [15] 吴志斌, 王宏斌. 中国鸦片源流考[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5): 29 - 33.
- [16] 周立民. 鸦片词汇的历时演变: 从“阿芙蓉”到“毒品”[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22(1): 36 - 41.
- [17] 陈恩维. 梁廷枏《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J]. 史学史研究, 2007(3): 64 - 70.

A Study of the Loanwords in *Haiguo Sish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WANG Zuxia¹, SUN Xinran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Bamberg, Bamberg, Bavaria, 96047, Germany)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notes *Haiguo Sishuo* (Four Descriptions on Foreign Countri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by the scholar Liang Tingnan in Qing Dynasty, which expounds on the thought of “planning for maritime defens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The book is rich in Chinese loanwords that record concep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the source words, these Chinese loanwords exhibit some regular phonetic changes. In terms of word form, the increased length and added “口” radicals give some loanwords distinct exotic features; the selected characters and the added morphemes also domesticate the loanwords. Among them, the selection of characters uses visual characteristics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form and meaning, while the addition of morphemes aims to emphasize semantics and highlight categories. The phenomenon of multiple word forms for one meaning is quite common,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riters and their habits of character usage, phonetic perceptions, etc. These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notes vocabulary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aiguo Sishuo*; loanwords; exotic feature; multiple word forms for one meaning

〔责任编辑:何敏敏〕